

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 社会学在中国

“十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阎明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C91-092
Y091



郑州大学

04010077190T

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 社会学在中国

“十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阎明 著



C91-092

Y091

001-5314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中国的第一代社会学者,曾经苦苦探索,以源自西方的社会学研究中国的文化体系与社会问题,试图在动荡的大时代中寻找一条富国强民之路。本书生动翔实地勾勒了中国社会学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建立、发展、变迁的过程,记述了陶孟和、李景汉、陈达、吴景超、吴文藻、潘光旦、费孝通等社会学家的学术观点、社会实践和人生探索,探讨了中国社会兴衰与社会学以及社会学者命运的联系。

本书内容丰富、资料翔实、见解独特,是研究中国社会学史的一部力作。

本书可供社会学界教师、学生和研究者阅读,也可供研究中国社会和历史的 researcher 参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本书封面贴有清华大学出版社激光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社会学在中国/阎明著.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ISBN 7-302-07211-6

I. 一… II. 阎… III. 社会学史—中国 IV. C91-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79295 号

出 版 者: 清华大学出版社

<http://www.tup.com.cn>

社 总 机: 010-62770175

地 址: 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邮 编: 100084

客户服务: 010-62776969

责任编辑: 周 菁

印 装 者: 清华大学印刷厂

发 行 者: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185×230 印张: 21.375 插页: 2 字数: 427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302-07211-6/C·9

印 数: 1~4000

定 价: 35.00 元

本书如存在文字不清、漏印以及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部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10)62770175-3103 或 (010)62795704

从前我国的士大夫，向来抱著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态度，对于现实的社会状况，毫不注意，只以模仿古人为能事。等到西洋的炮火惊醒了这迷梦，又完全拜倒在西洋文明之下。每每不顾国情，盲目的整个的把西洋的各种主义和制度，介绍到中国来。以为只要学得维妙维肖，便是社会的福利。哪知道主义和制度，介绍得越多，中国的社会，反到越发紊乱越发黑暗了。于是一部分有识之士，看出这种只模仿他人而不认识自己的流弊，便起而提倡社会调查运动。主张用科学的精密的方法，研究我们自己的现实社会。我们必须先认识自己的社会，然后才可以根据这认识，规定改进社会的计划。这如同治病一样，必须先检查病源，然后才可以处方下药。

——陶孟和《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序》

现在有一个很时髦的口号是“打倒”。凡不顺某人之眼，或不合某派之心的事物物，统统在打倒之例。孔子打倒，礼教打倒，宗教打倒，早婚旧历打倒，旧戏打倒，知识阶级打倒，反动打倒，娼妓打倒，马褂打倒，总之古传的大半可以打倒，目下许多见到的亦应打倒。有全盘打倒，一扫而光之势。热闹则热闹矣，紧张则紧张矣。结果呢，有的打而不倒，有的不打而自倒，有的打倒而又起来，而又打又倒。如此乱打乱倒不大要紧，老百姓夹在打与倒的中间可就大受其罪了。社会调查的工作，不是破坏是建设，是要调查出来何者的确应该打倒，如何才能打倒，打倒的步骤为何，打倒以后拿甚么较好的来代替，否则先慢著打倒。吃粗粮固然不好，而犹胜于无粮饿死，破屋固然不好，而犹胜于无屋冻死。好食物有了准备之后再弃粗粮，好屋建筑之后再拆破屋。否则非弄成鸡飞蛋打，国困民穷，甚至亡国灭种不可。

——李景汉《实地社会调查方法》第5页

前言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的第一代社会学者。他们曾经苦苦探索,以源自西方的社会学,研究中国的文化体系与社会问题,试图在动荡的大时代中寻找一条富国强民之路。为了坚持理想和信念,他们付出了青春、事业,有的乃至献出了生命。然而,在其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社会学并未如社会学者所期许的那样发挥作用,甚而在特定的年代遭到了遏止。这种局面一直到1979年方得以结束。

1979年春,在北京,数十位相关人士聚在一起,多次开会讨论恢复社会学。3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出席社会学座谈会,代表中共中央作了讲话。他指出,社会学在中国曾经遭受迫害、被禁止,否认社会学是一门科学,并且使用非常粗暴的方法,禁止社会学在中国发展、存在、传授,这是完全错误的,无论从哪一种观点来说都是错误的,是毫无道理的。不能认为有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就不需要社会学,这中间是不能划等号的。历史唯物主义不能取代关于社会的各种科学,各门具体的社会科学还是要专门研究的。生产关系既不能代替社会关系,也不能包括全部社会关系。社会生活里的问题并不因为由资本主义发展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就由有问题的社会变到了一个无问题的社会。对现代社会学积累的知识和方法,要认真研究,可以提出批评,但这种批评应是准确的、科学的、有限制的,不要随便下一个无限制的断语。要以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了解和研究社会学。^①

胡乔木讲话的主要目的,是试图在政治上和学术上,重新为社会学确立一席之地。他所讲的观点,在二十多年后中国社会学蓬勃发达的今天,已经成了无可争辩的共识了。然而,在那个意识形态刚刚开始“解冻”的特殊年代,尤其是对那些历经磨难、心有余悸的学者来说,具有极大的震撼力。以后来担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多年的袁方为例。当袁方受邀参与恢复社会学的活动时,其家人坚决反对,并劝他说:“千万不要再惹麻烦了!”后来全家商定,他可以参加会议,但只能听别人发

^① 参见《胡乔木同志在社会学座谈会上的讲话》(打印稿),1979年3月16日。

言,自己不要说话。^①是啊,这怎么能怪他们!回想1957年,正是因为参与恢复社会学,袁方被划成“右派”,送到“北大荒”劳动,并目睹了自己所尊敬的师长们,为了替社会学说话,一个个被打成“右派”,降职降薪,遭受折磨,蒙冤死去。因此,当胡乔木让大家放心大胆地工作,说是过去那种特殊的历史不会再重演,他要为开展社会学研究摇旗呐喊的时候,在座的人们无不感慨万千,其复杂的心情是难以形容的。

座谈会后不久,相继成立的有中国社会学会(后改为中国社会学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由费孝通担任会长和所长。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山大学等高校,先后建立了社会学系。有关社会学的论著陆续出版。1979年3月,邓小平在某次讲话中特别提到,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被忽视多年,“需要赶快补课”^②。至此,自上而下达成了共识:中国需要社会学。至于重新建立什么样的社会学,可以讨论。至少,社会学这个名词不再是禁忌。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终于得以重见天日。而期盼这一天的到来,从1952年“院系调整”社会学被取消算起,社会学者们等了整整27年!

社会学,究竟是怎样一门学科?它在中国曾经走过哪些不平凡的历程?本书即试图勾勒出社会学在中国兴起、成长、中断、再生的曲折历程,自始至终所围绕的主题,是作为一门学科的社会学与时代变迁的相互关系和作用。这个研究题目的价值在于:

第一,在学术价值上,近代中国社会所经历的变迁起伏跌宕——革命,改良,战争,政权的交替,文化的存废与兴革,这些都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所在。研究社会学的发展,可以为深入考察中国近、现代历史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而且,社会学这门学科既以现代社会为研究对象,又受时代环境所影响,这一学科同研究对象之间的密切互动,本身就构成了独特的社会现象,成为“社会学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sociology)研究的基本课题。特别是社会学作为一门起源于西方的科学,其在近、现代中国的曲折经历,生动地反映了科学与传统、理论与应用、学术与政治、革命与改良、中西方文化之间多重的矛盾和冲突。因此,中国社会学史的研究成果,能够丰富社会学的社会学研究领域。

第二,在社会意义上,中国自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所推行的社会经济改革,即是一场大规模的“社会改良运动”。其面对的各种社会问题,有许多都是中国第一代社会学者们所关注的课题,如人口、“三农”、劳工、家庭、犯罪、社区、城乡关系、财富再分配、利用外资、人文教育、文化建设、社会保障等。社会学者们早年的研究成果,不但包含了解决某些具体问题的答案,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对社会改革的整体思路,对今天的人们仍具有极大的启示。

^① 袁方:《要搞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不搞资产阶级社会学——有关五七年在党领导下开展社会学研究的一些情况》(打印稿),1979年3月15日。

^② 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载《邓小平文选》,第2卷,180~18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第三,在研究方法论上,从“显历史”的背后揭示“潜历史”。简单地说,历史是对过去的人物或事件的记述,而这种记述带有极强的选择性。一般而言,被“选择”的人物或事件,代表的是与记述者所处时代相适合的主流价值观,可称其为“显历史”。与之相对应的,是在漫漫的时间长河中,由于各种因素,大量的被埋没了的人物或事件,可称其为“潜历史”。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便充满了大量的“潜历史”的内容。也可以说,中国社会学史即是一部遭受淹没的“潜历史”。

例如,有不少人了解严复曾译介西方社会学说,但却不知美国传教士葛学溥、步济时等人在创建中国社会学上所起的关键作用。人们耳熟能详的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有胡适、陈独秀和李大钊,但一般不知道还有社会学家陶孟和。大家都很熟悉“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而不了解“社会调查运动”。很多人知道20世纪50年代主张控制人口的经济学家马寅初,而不了解自20年代起便致力于人口研究、提倡生育节制并在抗战时期主持了一次严格按照现代统计方法的大规模人口普查的社会学家陈达。在乡村问题上,人们都熟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而不太了解包括社会学者在内的以知识分子为主导的乡村建设运动。人们或许知道乡村建设的领袖梁漱溟与平民教育家晏阳初,但却不了解早期农村社会学家杨开道。儿童文学家冰心可谓家喻户晓,但人们却不了解她的丈夫、社会学家吴文藻在建立社会学的“燕京学派”方面所做的贡献。老舍创造了一个洋车夫的艺术典型“祥子”,李景汉却调查了1400位洋车夫的工作与生活。费孝通所倡导的“乡土工业”(或乡镇企业)是众所周知的,而吴景超曾提出的社会建设论,特别是其融合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新路”主张,却鲜为人道。人们都了解北京大学在近代中国曾开风气之先,而不知晓燕京、清华等高等学府亦曾人文荟萃。

因此,在历史研究中,惟有下功夫挖掘“潜历史”,方可能更真切而客观地反映历史的真实。这是作者撰写本书时在治学上的一点体会。

阎 明

2002年夏

目录

前言	Ⅲ
第一章 社会学在中国的兴起	1
第一节 以群学治群	2
第二节 学科体制建设的起点	7
第三节 “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	11
第四节 以实地调查记录社会变迁	17
第二章 社会学在中国的成长	27
第一节 第一代中国社会学者的形成	27
第二节 社会学学科之规模与地位	34
第三节 中国社会学之社会观	42
第四节 西方社会学对中国社会学的影响	46
第三章 中国社会调查运动	51
第一节 信仰社会调查	51
第二节 社会研究的困难	57
第三节 奠基石	62
第四节 “涓涓之水”	67
第四章 乡村社区——社会学的实验室	76
第一节 为谋求全体农民的幸福	76
第二节 认识农村,改造农村	82
第三节 民族文化之再造	90
第四节 求治必于乡村	95
第五章 人口——社会的基本元素	102
第一节 乐观? 悲观?	102

第二节	现代人口统计之路	108
第三节	生活难,工作亦难	113
第四节	中国现代人口普查的开端	118
第六章	出山作得许多声	124
第一节	吴景超的为人与治学	124
第二节	“第四种国家”的出路	127
第三节	中国工业化的途径	133
第四节	从“新经济”到“新路”	138
第七章	乡土中国	147
第一节	建立比较社会学的基础	147
第二节	黑暗中的探索	153
第三节	乡土重建	159
第八章	人·环境·文化	167
第一节	社会的文化基础	167
第二节	民族的位育	174
第三节	从历史到现代的桥梁	183
第九章	1949年前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	190
第一节	唯物史观的新社会学	190
第二节	以“阶级分析”调查农村	197
第三节	谋农村问题之根本解决	203
第四节	工人运动与劳工问题	207
第十章	社会学与社会建设	212
第一节	社会学者之政治观	212
第二节	社会学与社会行政	219
第三节	浮动的局势与人心	225
第四节	十字路口的抉择	231
第十一章	社会学在新时代	236
第一节	社会运动与社会学	236

第二节 重新定位	244
第三节 社会学的“改造”	251
第十二章 “社会学在新中国还有地位吗?”	258
第一节 为社会学说话	258
第二节 “修桥补路”	263
第三节 有计划按比例发展人口	268
第四节 “百家争鸣”与“互相监督”	275
第十三章 学术与政治	281
第一节 根本的分歧	281
第二节 “败军之将不可言勇”	287
第三节 “国家的放火犯”	293
结论	299
参考文献	303

第一章 社会学在中国的兴起

社会学起源于19世纪中叶的西欧。从历史背景看,社会学的兴起是顺应西欧急速的社会变迁的需要而产生的。在西欧工业化、都市化的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社会问题需要解释,并加以解决。从学术背景看,此时自然科学已形成了较完整的体系,人类对于自然界的认识日益精进,采用的研究方法或手段不断得到改善,学科的分化也愈来愈精细。因此,人们对于深入地认识社会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1838年,法国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 1798—1857),在他所著《实证哲学》第4卷中,首次使用“社会学”一词。这在习惯上被看做是此门新学科生命的开始。此前,他曾称这门新学科为“社会物理学”,期望像牛顿发现物理学定律一样,发现一套能解释社会现象变化规律的“孔德定律”。后来,孔德以拉丁文 socius(联盟,伙伴)和希腊文 logos(学问、真理)合成 sociologie^① 这一新词。在创立社会学的过程中,孔德认为,人类对于各种自然现象——机械的、无机的、有机的,都已有专门的学科分别进行研究,即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这些学科,依据其研究对象的逐渐复杂而依次精深。同自然现象相比,人类社会组织最复杂,研究社会现象的学科也应最精深。因此,社会学是最晚出现的一门学科,应当是建立在其他学科基础之上,并且要充分利用其研究成果的“科学之王后”(queen of sciences)。

自社会学诞生之后,其目标就是以科学方法,研究人类的群体行为和组织结构,解释人群间的对立与冲突,探求社会运行的一般法则,最终建立一个和谐、公正而有秩序的社会。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社会学的发展并不尽如其创建者所期望的那样。社会学者们围绕着一一些基本问题,如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究竟是什么,社会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关系应当如何,一人一议,十人十议,难以获得共识。而且,尽管社会学以“科学”自诩,但其性质却决定了它与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外在因素的关系,远比其他学科同这些因素的关系更加密切而复杂。再者,作为一门学科,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工作,即培养人才、出版书刊、组织专业学会、开展学术活动等,也才刚刚起步。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自西方传入中国的社会学,正是这样一个自我期许极高,却又处于幼年的学科。而在这一时期,中国社会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剧烈变动。应当如何处理同西方的关系,解救民族危机并寻求一条富民强国的现代化道路,这是近代中国社会演变的主线。正是在这样的时代大潮中,社会学被介绍到了中国。可以说,与其在西

^① sociologie 即法语“社会学”。

方的发展历程相比,社会学在中国所面对的将是更大的机会和挑战,也承担了更为艰巨的责任。

第一节 以群学治群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社会学作为“西学”的一部分被介绍到中国来,这标志着中国知识界对于西方的认识,从科学技术到历史地理,进而到社会制度与思想的层面,逐步深入。最初在中国出现的社会学译著,包括英国社会进化论者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美国社会学家福兰克林·季廷史(Franklin H. Giddings, 1855—1931)及数位日本学者的论著。1895年,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发表《原强》,首次介绍斯宾塞及其群学。^①另外,《昌言报》上曾连载曾广铨翻译、章太炎笔述的《斯宾塞尔文集》^②,梁启超和谭嗣同也分别在他们的著述中提到过“群学”或“社会学”的概念。1902年至1903年,有几部社会学译著出版,即章太炎翻译的日本学者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③,日本学者有贺长雄的《族制进化论》^④,严复翻译的斯宾塞的《群学肄言》^⑤,吴建常自日文翻译的季廷史的《社会学提纲》^⑥及马君武所译斯宾塞的《社会学引论》。^⑦

这些最早翻译、介绍社会学的人,都是当时中国思想界的领袖或留日学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曾参加过社会改良或革命运动。他们所翻译的西方或日本知名学者的著作,以论述当时流行于全球的社会进化论思想为主。最初,这门新学科所采用的译名,有群学、人群学、社会学、公益学等。但是,在多个译名中,最终流传下来的是日译“社会学”。实际上,日本在自西方引入社会学的初期,除“社会学”以外,也曾同时采用过其他译名,如“交际学”、“世态学”等。源自西方的社会学,却通过日本传入中国,这一方面是因为日本先于中国自西方引入社会学,早在1880年,斯宾塞的著作即译成日文出版,东京大学于1893年开设社会学课程,为世界各大学之首;^⑧而更重要的是同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关。

甲午战争,中国被日本打败。日俄战争,日本战胜俄国。这在老大帝国引起了极大的震撼,各方关注的焦点随之转向了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向西方学习,在短短的几

① 严复将斯宾塞译作锡彭塞,群学即社会学。《原强》,载天津《直报》,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初八至十三日(1895年3月4日至9日),辑入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册,上,5~1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② 章太炎:《斯宾塞尔文集》,曾广铨译,载《昌言报》,1898年8月17日—10月30日。

③ [日]岸本能武太:《社会学》,章太炎译,上海,广智书局,1902。

④ [日]有贺长雄:《族制进化论》,上海,广智书局,1902。

⑤ [英]斯宾塞:《群学肄言》,严复译,即 *The Study of Sociology*,上海文明编译局,1903。

⑥ 即市川源三的译本,季廷史, *Theory of Socialization*, 为其《社会学原理》一书的提纲,1903。

⑦ 即《社会学原理》的第2编《社会学引论》(*The Introduction of Sociology*),西江欧化社发行,1903。

⑧ 参见《社会学史》4、111页,台北,启明书局印行,1961;李剑华:《日本之社会学界》,载《社会学界》,卷一,221~245页,1927年6月。

十年中取得了巨大成效,这其中必定有值得中国借鉴的经验。特别是日本与中国,无论在地理位置上,还是在民族习性和思想文化等方面,都很接近。通过日本来了解西方,这应当是一条捷径。因此,日本便成为当时中国了解西方文化的一扇窗口。

甲午战后,中国留日学生人数大增,1905年至1906年之间达到高潮,每年约有8000人到日本留学。^①1905年,科举制度的完全废除,对新式学校教育以及留学教育又是一大促进。这一时期的留日学生,与此前去欧美学习工程技术的留学生相比,有很大的不同。他们人数众多,热心参与政治活动,主要以法政、教育或军事等为专业,自日文译介了大量关于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书籍,其中包括多部社会学著作。再从翻译技巧上来看,日文译中文比直接翻译西语著作有着极大的便利。日本在幕府末期及明治维新时期,直接从欧洲输入西方文化。日本人借用汉字翻译西洋词语,又依汉语构词法径造新词。这种新词,中国人一听解说便可理解。因此,在现代汉语的词汇中,采用了不少从日文翻译的名词,社会学便是其一。另外,在明治时代,日语的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等,在日文中几乎全用汉字书写,只是动词的语尾和几个助词用假名书写。梁启超在《论学日本文之益》一文中说:“学日本语者,一年可成,作日本文者,半年可成,学日本文者数日小成,数月大成。”^②可以说,这些翻译技术上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日文译著的大量出版。章太炎便是在短暂的流亡日本期间,翻译了日本社会学者岸本能武太的著作。

日本社会学对中国社会学永久性的影响,是“社会学”一词。而真正抓住西方社会学思想的精髓,对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的,是近代著名的思想家、翻译家严复。

严复(1854—1921),字几道,福建侯官人。严复是最早直接接触西方哲学与社会思想并将之系统介绍给中国的中国学者,以他自己的话来说,是真正了解西方社会的“命脉之所在”。^③严复于1877年公派去英国学习船政,但在学习期间,他却对西方社会政治思想发生了兴趣,阅读了大量代表西方时代思潮的著作。回国之后,严复所学以谋“富国强兵”的技术,并未受到重视;他非科举出身,因此也没有社会地位。他发愤治八股文,准备科举考试,但却屡遭失败。

甲午战后,严复因中国割地丧师而大受刺激,遂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介绍西方思想,主张社会变革。《原强》正是代表他开始走上公众舞台,发挥影响力的论著之一。在《原强》中,严复首先简述了达尔文的进化论,然后介绍斯宾塞及其“群学”。斯宾塞以其宏大的百科全书式的知识体系,运用“进化”这一生物学术语,论证自然界、人类社会乃至整个宇宙的演变,提出“适者生存”的概念。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达尔文的“物竞天择”和斯宾

① [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谦、林启彦译,39页,北京,三联书店,1983。

② [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286页。

③ 严复:《论世变之亟》,载天津《直报》,1895年2月4日—5日,辑入《严复集》,第1册,上,1页。

塞的“适者生存”，成为广为人知的表述进化论思想最简捷有力的口号。同时，斯宾塞以进化论原理，解释社会历史的演进，创立了社会进化论。他也因此成为19世纪下半期最著名的社会思想家之一。

当时中国知识界流行着一种思想方法，即将西方思想同中国古代圣哲的思想作比较，试图找到双方的相通之处。作为一位饱读经书的学者，严复也不例外。他在解释群学时，主要依据的是荀子的思想。群学的“群”字，即出自《荀子》。这一做法可谓非常恰当。荀子是中国先秦哲学家中最系统地阐述过社会组织的一位。荀子认为，人之贵于禽兽者，以其能群也。“人能群之”的特性是共同生活、分工协作并建立政治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基础，也即社会生活的基础。

严复赞同孔德及斯宾塞所认为的群学是各学科之后的“最高学问”，也是最难治的学问。他认为，研究群学的目的，是为了明“群之理”，以“图自强”。他说：

“有国家者，施一政，著一令，其旨本以坊民也，本以拯弊也，而所期者每不可成，而所不期者常以忽至。及历时久而曲折多，其利害藩变，遂有不可究诘者。是故不明群之理，不独率由旧章者非也，而改弦更张者乃遽误，因循鹵莽二者必与居一焉。何则？格致之学不先，偏僻之情未去，束教拘虚，生心害政，固无往而不误人家国者也。是故欲治群学，且必先有事于诸学焉。……群学治，而后能修齐治平，用以持世保民以日近于邕治馨香之极盛也。”^①

从这里可以看出，严复非常重视群学的作用，他认为如果不研究“群事”，不明了“群理”，在治理国家上就会有很大的盲目性。而要研究群学，则先要研究各门科学，并以此为基础研究群学，这样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严复进一步运用斯宾塞的社会有机论，来解释中国的问题。斯宾塞认为，社会组织就好似一个生物体，各个部分之间并非是机械的结合，而是有机的互动，因此，“富强不可为也，特可以致致者何？相其宜，动其机，培其本根，卫其成长，使其效不期而自至。”在严复看来，中国富强的根本在于“群”，或者说，是不能“群”的问题。具体地讲，就是民智已下，民德已衰，民力已困。在此情况下，仅靠一两位领袖的作用，是不能振兴国家的。严复又引述苏子之言：“天下之祸，莫大于上作而下不应。上作而下不应，则上亦将穷而自止。”中国的民众如此衰弱，而“善政如草木，置其地而能发生滋大者，必其天地人三者与之合也，否则立槁而已”。^② 因此，要解决中国的问题，既要治标——收大权，练军实；也要治本——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

1903年，当严复正式翻译出版斯宾塞的《群学肄言》时，他更明确地提出社会改良的主张。《群学肄言》是一部关于如何研究社会学的书，算不上斯氏的代表作，但严复从斯

① 严复：《原强》，载《严复集》，第1册，上，6~7页。

② 此段中的引言均出自《原强》，载《严复集》，第1册，上，13~14页。

氏大量的著作中选择了它,说明他很看重社会学的方法论。在严复看来,人们由于受到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很难理智、全面地看待事物。而斯氏这部书的关键,就是充分论述了认识社会、解决社会问题之难,从而纠正了他自己“生平好为独往偏至之论”。^①应当说,正是严复所经历的挫折,使他对斯宾塞的观点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他曾写万言书欲上达皇帝,为新政出谋划策。可是戊戌变法却以失败告终。1900年的“庚子事变”,也使他更深切地体认到,中国民智未开,不适于实行共和体制;中国文化亦不应完全否定。他反对激烈的革命,主张根据国情,批判地接受旧文化,逐步改进:

“乃窃念近者吾国,以世变之殷,凡吾民前者所造因,皆将于此食其报。而浅薄剽疾之士,不悟其所从来如是之大且久也,辄攘臂疾走,谓以旦暮之更张,将可以起衰,而以与胜我抗也。不能得,又搪撞号呼,欲率一世之人,与盲进以为破坏之事。顾破坏宜矣,而所建设者,又未必其果有合也。则何如稍审重,而先咨于学之为愈乎?”^②

在这里,严复批评那些浅薄急进的人,意识不到事物长期演变的前因后果。他们将袖奔走,说是在旦夕之间便可振兴国家。未成,便又莽撞高喊,要带着大家盲目冒进,进行破坏。但破坏之后所新建的却又未必合适,为什么不能慎重一些,先学习研究,这样会更好一些。在《群学肄言》中,严复多次以按语的方式感叹改革之难,不能太急、太剧烈。例如“呜呼!此吾国变法之所以难也”,“呜呼!观于此而知吾国变法当以徐而不可骤也”。^③高凤谦为《群学肄言》作序,也呼应严复的观点:“世之言群治者,以为可不学而能,随吾意所至,信口以道,曾若无所庸心。无怪乎人人言群治,日日言群治,而群治终不进也。《群学肄言》一书,几十万言,千端万绪,而极其究竟,亦曰群治之难言耳。”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许多人以为不必进行研究,便可随自己的心意治理社会,结果人人说要治理社会,天天说要治理社会,然而社会还是改进不了。《群学肄言》一书,几十万字,千头万绪,其根本的目的是阐明治理社会之艰难。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记述个人的经历或社会的历史,人们往往注意他们所想看到的事物的某个方面,进而称之为事实。特别是像社会进化论这样的经典理论,也曾经由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国家,从各自的背景和需要出发,做出相应的阐释。如前所述,社会进化论曾经是一个在全世界范围内影响极大的学说。当时许多国家的主流思想界,都根据社会进化论来强调人类生存竞争的残酷性,结果或倾向于个人主义(如美国),或力倡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如德国和日本)。在中国,严复所翻译的一部有关进化论的著作,即英国学者赫胥黎的《天演论》,鼓吹生存竞争的思想,为主张革命的人们提供了理论

① 严复:《译余赘语》,载《群学肄言》,改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② 严复:《译群学肄言序》,载《群学肄言》。

③ 参见《群学肄言》,49、50页。

根据。因此，他在翻译《天演论》后继而翻译《群学肄言》，目的就是要使“蜂起者稍为持重”。^①然而，从《原强》到《群学肄言》，严复强调的是社会进化论的另一个重要思想，即在社会历史的发展中，千变万化的各种因素之间定有因果关联性，而这种因果联系是一种有机的联系，绝不能机械地割断。他说：

“盖深知夫群之差数功分，皆取决于其民德之何如。使本弱也，而忽强；本贫也，而忽富；本僇野也，而忽文明，必无是也。民德未孚，虽以术为之，久乃废耳。又使知政刑礼俗，所以成其如是者，一一皆有其本源。……是故用天演之说以言群者，将所以除愤解罣，而使出于中庸之道而已。”^②

严复认为，社会的差别取决于其人民的品德素质。使一个本来贫弱、不发达的国家，突然之间变成富强、文明的社会，必定办不到。若人民的品德素质不高，仅靠技术或策略达到目的，也不能维持长久。再者，制度礼俗的形成，都有各自演变的根源。因此，用进化论来解释社会发展，可去除愤怒喧嚣的情绪，令人客观理智地思考，这是出自于中庸之道。在这里，严复终于将西方的科学方法，同中国传统的中庸之道融会在一起。他据此既反对激烈的变革，又批驳守旧者：“得吾说而存之，彼两家之难可以解。夫维新之急者，有所祈也，守旧之笃者，有所惧也。惟群学通，则祈与惧皆可以稍弛。”^③图谋社会改革的人期望高，往往操之过急；维护旧制度的人，害怕变革太大，又失之保守。只有真正理解了群学，才能融合新旧，解决两难之困境。而在现实中，中国真正的出路在于教育。1905年，严复在伦敦遇见孙中山，他对孙中山说：“以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之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之于丁。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④

综上所述，严复反复强调社会改革的艰难。他认为，不是不要变法，而是不能急功近利，妄想在一夕之间振兴国家。事物的发展总有因果联系，倘若不自教育入手，从根本上改善国民素质，仅以政治的手段，实施几条新法，绝不可维持长久。所谓破坏容易建设难。社会的改造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不可操之过急。要先对中国社会做精密切实的研究，然后再来制定适当的救国方案。研究社会学，即可帮助人们了解社会治乱兴衰的原因，进而提出良政之策。但是严复的这一重要思想，在当时一片救亡图存的呐喊声中，没有得到太多的回响。在他的多部译作中，影响最大的是《天演论》。这本书自1898年在中国出版后，十多年中发行过三十多种不同的版本。“优胜劣败，适者生存”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中国人的心，使得稍有血性的人都知道，中国必须发愤图强，才可免于亡国的命

① 《严几道与熊纯如书札节钞》，载《学衡》，第16期，4页，上海，中华书局，1923。

② 《群学肄言》，312页。

③ 《群学肄言》，312页。

④ 王遽常编著：《严几道年谱》，辑入《民国丛书》，第3编第77册，74～75页，上海书店，1991。

运。然而,为了急于救亡图存而进行的种种尝试,也使中国人付出了不小的代价。认识社会,解决社会问题,绝不能靠情感,非得用理性,扎扎实实地下功夫,一步步去做。这一思想,后来成为中国社会学发展的一大特色,但同时也预示了社会学在中国复杂而曲折的经历。

第二节 学科体制建设的起点

在近代学术史上,一门学科的发展往往体现在两个方面,或是说,靠两种力量的推动。一是学者个人发表相关的研究成果,二是在高等学校中设立相关科系培养学生,成立专业学会,出版专业期刊等,即所谓学科体制的建设工作。在中国社会学的传入时期,严复等人译介社会学说,可代表第一个方面的工作。然而,社会学在中国学术界扎下根,并有了长足的发展,是由于它作为一门学科,在高等学校体制中,形成了完整的教学、研究体系。在此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的,是数位美国传教士,因为他们在教会所办的大学中的热心推动,促进了这门学科建设。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开始以日本的教育体制为样板建立近代高等学校,如京师大学堂、京师政法学堂等。据光绪二十八年(1902)的“大学堂章程”,京师大学堂按日本体制分8科,在经学科和史学科所列课程的“随意科目”(相当于选修课)里列有“公益学”,并解释为“日本名社会学,近人译作群学”。但“以上各随意科目,此时初办碍难全设,应俟第一期毕业后体察情形,酌量渐次添设”。^①1911年,京师大学堂改为国立北京大学,仍列有社会学课程,但直到1916年才首次开设这门课程,由章太炎的学生、自日本留学回来的康宝忠任教,这是中国人讲授社会学之始。^②

20世纪初期,国立高等学校不发达,也不重视社会学的发展。相比之下,西方教会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却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时最早、最热心推动社会学的教学与研究的,也是这些教会学校。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社会学初期的发展,也与基督教有着密切的关系。许多早期美国社会学家,或出身于牧师家庭,或曾经当过牧师。哈佛大学的社会学课程,最初是在其神学院中开设的。^③同美国相比,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与基督教有更加直接的联系。

西方传教士到中国开展教会工作的历史很长。传教士们在办教会的同时,进行更广泛的慈善与文化活动,如设立医院,翻译出版有关西方科技和文化的书籍,并逐步开办小学、中学乃至大学。教会办学之初招生很困难,因为传说教士要把孩子们杀死,以便将其

^① 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北京大学史料》,第1卷(1898—1911),101、104、10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② 孙本文:《当代中国社会学》,217页,台北,里仁书局,1982。

^③ Barry V. Johnston, Pitirim A. Sorokin,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Lawrence, Kan.: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95, p. 56.